

## 目 录

### 尊师长重情谊 一代风范

——回忆周总理……………高肇甫（1）

宋庆龄的莫斯科与柏林之行……章克（8）

### 忠心耿耿 为国为民

——在纪念刘民生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赵志浩（28）

革命老人刘民生……………靳星五（33）

我走过的道路……………张宣武（61）

### 一位西北军将领的自述

……………韩多峰（93）

盐城起义前后……………戴心宽（141）

### 怀念盐城起义组织者戴心宽同志

……………顾草萍（146）

我与黄埔校友李延年……………李仙洲（156）

## 我们所知道的李延年

.....邓伦魁 刘雪门 刘天民 李守仁(167)

李延年潼关御寇.....刘殿桂(173)

## 风风雨雨四十年

——济南忆旧.....辛铸九(177)

日伪盘踞时期的济南.....孟庆良(192)

章丘旧军孟家遭匪记.....韩 炬(209)

## 渤海区接受联合国救济物资的回忆

.....曲 溪(216)

临朐“无人区”纪实.....谭家昌 程士贵(222)

顽匪王应心覆灭记.....高 亮(232)

## 美国长老会和山东自立会事略

.....曲拯民(239)

# 尊师长重情谊 一代风范

## ——回忆周总理

高 肇 甫

每当我听到或看到周总理这个熟悉亲切的名字时，那镂骨铭心的件件往事，深切怀念的激情便油然涌上心头。

1949年7月，我遵先父高亦吾“日后得悉周恩来行止时，可速去找他，切记”的临终遗言，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信，历述“遗言”的前后经过。不久就接到总理要我去北京的复信，当时我高兴得真不知说什么好。

我是这年9月间进京的，接待我的是总理秘书杨超同志。几天后，总理又派人给我送来50元钱，并转告我安心等待。

1950年2月，总理将我安排在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处档案科工作。

1951年12月3日，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今天下午，总理要见你，现在就来吧！”一股幸福的热流在我胸中沸腾起来，久久不能平息。继而，不知怎的，我的心弦又陡然紧绷起来：见到总理该说些啥呀？想着想着进了总理办公室。总理亲切地握住了我的双手……他那慈祥的面容，和蔼的态度，爽朗的笑语，象和煦的春风吹融了我那紧张拘束的心。落坐后，总理和我攀谈起来：

总理：今天见到你很高兴，我对你父亲高亦吾老师的印象最深了。令尊大人什么时候去世的？

笔者：1941年2月5日。

总理：得的什么病？

笔者：大头瘟（现在医学上叫脑膜炎）。

总理：服的什么药？

笔者：因年代久远，记不清了。

总理：药方还有没有？

笔者：家中几次被抄，早已不存了。

总理：要是现在，卫生医疗条件好了，高老师也许不会早亡的。现在师母身体怎样？

笔者：很健康，感谢总理的关怀。

总理：你现在几个小孩？过去在家干什么？

笔者：一个小孩，我过去在家种地劳动。

总理：中国有句古话叫“庄农最为先”嘛。

接着总理便追忆起和我父亲在一起的一些往事：“我十三四岁在奉天（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各方面都亏了令尊的关怀。他向我介绍了许多好书，其中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写的《革命军》，对我影响很大。这是一本宣传革命的书，其中提到‘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号召四万万同胞要‘掷尔头颅，暴尔肝脑，同封建统治者决一死战。’”

“高老师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宣传革命思想，多次声泪俱下地讲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悲壮事迹。同学们听了大都义愤填膺，潸然泪下从那时起，我就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记得一次老师带我去外国租界地，他告诉我就是这些蓝眼黄发的外国洋人，依仗他们的船坚炮利，把我们的大好河山瓜分为他们的殖民地……后来我去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令尊随即到北京京兆尹公署任职。在这个期间，我去看过他两

次。其中一次他对我讲：你们在天津办的《觉悟》社已轰动京畿上下官府，你的名字据说业已在册。当局严令取缔《觉悟》社，并逮捕其一切成员，你要当心。京兆尹公署当时在地安门，现在不知那个单位占用。”秘书插话说，不清楚。

总理又问：以前我与令尊的来往信件还有没有？

笔者：没有了，很可惜。

总理：我受教于高亦吾老师，获益非浅，迄今感念尤甚。

总理最后勉励我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不知不觉间，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在情深意长的融洽气氛中结束了。

1953年，中央机关人员下放，充实基层。我积极响应，申请下放。总理非常高兴，亲自召见我鼓励道：“你做得很好，你是我的亲朋好友，应该事事带头。下去后，要依靠群众做好工作。”我激动得一时难于措词，只是热泪盈盈地握着他的双手说：“请总理放心！”总理笑着说：“以后不要老是总理总理的，你我是同志是兄弟嘛。”

1961年7月，总理来信邀我于8月份进京欢聚。我和爱人立即收拾行装，匆匆启程。8月9日到达北京，国务院交际处张处长接见了我们，说总理近日连续接待外宾，忙于国事，实在无暇，请安心等待。张处长亲自帮助我们下榻于虎坊桥旅馆。

1961年8月21日，天朗气清，金风送爽，莲荷飘香。我们夫妇同三个孩子登上了去国务院的汽车。到达西花厅门前车子刚停，几位解放军同志满面春风地拥上前来，将三个孩子抱下汽车，由总理秘书曲同志带我们去见总理。未到办公室门前，只见总理站在高高的汉白玉台阶上，微笑着向我们招手。我当时如醉如痴，仿佛在做梦，眼前是异样的天地，

耳边是欢迎的掌声。总理首先和我爱人李玉英握手，接着移向我，两手按着我的双肩，凝视良久道：“你是个胖子，怎么这样瘦了？”我一时语塞，感情激动得无法抑制，眼睛模糊，热泪纵横。待心情平静下来，我望着总理那日益增多的白发和深深的皱纹，深知他为国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心情不禁沉重起来，悔不该全家来打扰总理，想到这儿象做了错事似的。总理见我神色不安，似乎洞悉了我的心思，爽朗的笑了起来，俯身对着孩子，看看这个，望望那个，扶扶这个的肩头，摸摸那个的面颊。逐个问了名字，最后把小女儿高润抱起来，走进办公室。总理提议同我们一家合影，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喜出望外。曲秘书请来了摄影师，总理亲自为我们安排位置，他站在我们5口人中间，两手分别扶着大女儿高敏和二子高振国的肩膀。照像机“咔”的一声，拍下了这张使我们永世难忘的照片。

我们围坐在总理身边，就象一家人一样。服务员送来了冰镇西瓜，总理带头陪我们吃起来。当总理问到母亲身体健康情况时，爱人怕我心直口快，实话实说（当时母亲由于生活困难，正患水肿病，经常腹泻），引起总理的惦念，就抢先代我回答：“婆母身体很好，请总理放心。”而后，总理又问我所在矿上的生产情况，设备怎样？安全条件好不好？每人每月口粮多少？是什么粮食？能吃饱吗？我一一回答后，总理望着我们那五张蜡黄瘦削的面孔，攥着孩子们那嶙峋细长的胳膊，神色肃然，语意深长地说：“好心做了错事，又有什么办法！”

中午，总理特意与我们共进午餐，边吃边谈，整个餐室充满了笑语欢声。总理不时地用筷子夹起菜来填到孩子们的小嘴里。这是我们一生中难得的美餐。下午3时许，我们怕

总理劳累，便难舍难分的向总理告别。总理想留下二子振国在北京上学。当时他才6岁，看到母亲要走便说：“俺不！俺不！”总理笑着说：“他说的是地地道道的山东话。”

在京期间，总理因工作忙，就派了一名科长，专陪我们参观、游览。时间总是无情的也是吝啬的，转瞬来京将近一月，我们准备回程，总理再三挽留。我们实在不忍再分总理的心神，决定动身。总理给母亲拿上人参、燕窝，赠给我们咖啡和白糖（那时白糖是很紧缺的）等珍贵物品。路经济南母亲住处时，她老人家得悉总理的问候，见到总理给她的礼品，感动得热泪盈眶。

是年12月19日，我妹妹高肇申代母亲给总理寄去一信，准备岁底进京探望。总理于同月29日亲笔给母亲写了回信：

荣萱师母：

10月26日和12月19日两信均悉。因工作繁忙未及时回信，尚希见谅。来信说你和肇申想在春节前后来京，时值假期，车辆拥挤，特别是天气寒冷，您年高体弱，恐难堪旅途劳累，届时我是否在京尚难料定，恐您徒劳往返，我甚不安，我意您勿来为妥。现附上放大的老师照片一张，请留念。专复。问肇甫夫妇、肇申均好。颖超附笔问候。

周恩来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廿九日

我们收到这封万金难易的总理手书，全家人争着读呀，抢着看呀，母亲戴上老花镜看过之后，把信笺放在胸口，贴在腮颊，饱尝着总理和邓大姐所给予的关怀和温暖。我们一家人又仔细地望着总理寄来父亲的照片。我想：爹爹呀，您老人家若是健在，那该有多好哇！我又想：解放前，总理为

革命戎马倥偬，四海为家；解放后，为人民五洲奔走。从没有消闲。可他始终没有忘记少年时代的老师高亦吾，难得呀。我真为九泉下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

1962年，总理因惦记年迈体弱的师母，汇来人民币一百元，让母亲滋补身体。1963年母亲病故，总理闻讯立即令总理办公室来函：“……来电收到，已转报总理，总理希望你节哀，努力工作，并嘱寄去一百元作为安葬的补助。”充分表现了总理尊师敬长的崇高风范。

1965年8月底，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我致函问候总理近况，总理值班室复信说：“你8月31日给总理的来信收到了，已报告总理和邓大姐，总理和邓大姐很高兴……”

1966年，遥闻邓大姐身体欠安，我又去信问候。接到回信说：

“你们给总理的信收到了，我们报告了总理和邓大姐，邓大姐谢谢你们对她病情的关心，并说她的病已大好，请你们不必挂念。”

1976年1月，周总理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们顿感天倾地陷，一时举家大恸，我们夫妇决意赴京吊唁。动身前，接到邓大姐身边工作人员发来的电报：

大姐嘱外地亲友一律不请。千万不要来京，希谅，谢谢！

我们深深理解那时邓大姐的处境和心情，只好眼含热泪，延颈瞩目北京。

1979年11月，我妹妹肇申应邀去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参观。总理当年的同学陆广吉先生（辽宁省副省长）回忆说：1936年西安事变时，我是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总理到西安后，见到我首先问及高亦吾老师的行踪，并语重心长地说：

“我对高老师的印象最深，受其影响最大，至今思念尤甚。”

她从沈阳回来路经北京时，曾去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访问，负责人王信平同志谈：“我们在整理总理事迹时，发现一份资料，内容是总理在延安接见外宾并答外国记者问时的一段记载，总理在谈到他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说：‘我少年时代得山东高亦吾老师的栽培，可以说没有高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总理对家父的敬仰和尊重，也反映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不平常。

缅怀往事，意在今天与未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是十几年了，可是我回想起来，总理那可亲可敬的崇高形象如在眼前，总理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章丘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提供）

# 宋庆龄的莫斯科与柏林之行

章 克

## (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不久，武汉国民政府中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所谓国民党左派也加入到反共、反工农的大合唱，公然主张宁汉合流（即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共同反共。孙中山先生缔造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此就宣告结束。

在这种形势下，宋庆龄在与鲍罗庭、邓演达和陈友仁商量后，决定暂时撤离武汉，到苏联去共商大计。行前曾于7月14日在汉口英文《人民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告别书，题为《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指出：汪精卫等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本意和理想。因此，对于这种新政策的执行，她将不再参加。

这样他们就决定分三批撤离武汉赴苏联。邓演达化装为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的炊事员，随铁罗尼于6月30日秘密离开武汉，沿京汉线北上郑州，在郑州与在冯玉祥西北军中工作的部分苏联军事顾问会合，由他们任向导，经西安、榆林、包头、五原，越戈壁大沙漠，到外蒙首都库伦（今乌兰巴托），再由库伦到西伯利亚铁路的上乌金斯克站，由该站坐火车直达莫斯科。于8月15日左右抵达莫斯科，历时约一个半月。

第二批离开武汉的是鲍罗庭总顾问为首的全部苏联军事、政治顾问团，人数约有五六十人。加上美国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陈友仁的长子陈丕士（现住香港，任马可波罗学会会长），次子陈伊范（现住美国，正在撰写《旅美华侨史》）和我。另外还有湖北总工会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当时改名为苏联顾问团的卫队）40余人。这一行人是在7月15日离开武汉的。在汉口车站出发时，所有武汉国民党政府的主要人员，包括汪精卫都到车站欢送。列车有近20个车厢，满载沿途顾问们吃用的罐头食物、卡车、轿车和轻重机枪及步枪等。火车在下午3点左右开出的，到第二天中午才到郑州。冯玉祥亲自到站迎接，并邀鲍罗庭到他寓所休息。鲍罗庭没有接受他的邀请，坚持和其他苏联顾问一道在车上住宿。第二天我陪同鲍罗庭到冯玉祥所在的西北军总部拜访了冯玉祥，西北军总部外事处长简又文任冯玉祥的翻译，我任鲍罗庭的翻译。两人整整谈了一个上午。首先由冯玉祥发表意见，大意是：武汉政府中的共党分子做得过火了，不合乎中国的国情，失去了人民的同情，所以国共合作无法再合作下去，只好宁汉合作，共谋国事。他本人也只好与蒋介石携手，虽然这并非他的本意。但因他是非蒋的嫡系，今后在武器装备和军饷分配上恐均有问题，所以还要请苏联多多帮助。鲍罗庭当时没有作任何表示，只说：“你的要求，回国后当报告苏联政府。”第三天，冯玉祥邀请苏联全部顾问到他的总部吃午饭，席间抱怨武汉工农运动搞得过火，还讲了一些不满的话。冯玉祥把西北军方面要求苏联支援的东西——枪械、弹药、运输工具、款饷及顾问等，开了一张单子，交给鲍罗庭，并请鲍罗庭在郑州多住几天，不要急于回国。鲍罗庭听了，认为这是变相的扣留，感到情况有些

不妙。于是对冯玉祥说：最好你亲自派一二位亲信和我一道到莫斯科去，我到莫斯科后尽快把你派去的人介绍给苏联政府的有关方面，由苏联政府的代表和你的代表直接商谈这些事，这样做比较快而且有效。冯玉祥听后，稍停了一会，说：那也好，不过还要请鲍总顾问把我冯玉祥当前的处境和苦衷多多向苏联领导人反映反映，使得我能在苏联的支持下，把北伐进行到底。鲍罗庭说：我自当尽力帮忙，继续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贡献一切。鲍罗庭并表示因为苏联政府急于要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所以不能在郑州多留，一两天后就要动身，兼程前往莫斯科。希望西北军的代表和顾问团的人员一道去，并要求尚留在西北军的四五位苏联顾问也一道回去。冯玉祥都一一答应了。第四天，简又文就到停在郑州站的专车上来看鲍罗庭，并告诉他说：冯总司令已派定李连三（冯妻李德全的大弟）、张允荣（西北军骑兵师长，曾随冯玉祥到过苏联）陪同顾问团到苏联去接洽一切。这样顾问团的专车就于第五天离开郑州，向陕西的灵宝驶去。到灵宝后，团员及卫队把列车上所有的车辆、食物、帐篷、弹药、枪械等全部搬到卡车上（大约有20辆左右），所有人员分乘卡车和轿车数辆继续前进。当时陇海路的火车只通到灵宝，过灵宝就没有铁路了。从灵宝到内蒙的五原，要经过潼关，在风陵渡越过黄河，再经榆林、包头、皇爷庙。出榆林后就是沙漠。从五原到外蒙的库伦，要越过好几座山，汽车全由当地人先拉到山上，然后徐徐放下去，跋涉十分艰苦。到库伦前要横越戈壁大沙漠，气候干燥炎热，除蒙古人的骆驼队外，终日看不到任何东西，看不到一草一木，也看不到水。在戈壁沙漠上行路，十分危险，若没有蒙古本地人作向导带路，往往有葬身沙漠的危险。沙漠上的风向是随热气流而变动的，出发时是顺风，到了中午或

下午可能变为逆风，若不预先察觉，就有可能被逆风带来的沙所埋没。苏联顾问团的一位法籍无线电专家，就是这样丧生的。

苏联顾问团从汉口出发，到莫斯科时，共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除一法籍无线电顾问外，全部顾问都平安到达莫斯科。

第三批离开汉口的是宋庆龄、陈友仁和雷娜·普鲁姆，同行的还有陈友仁的两个女儿西尔维亚·陈和尤拉·陈，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吴之椿教授亦陪同前往。

他们是乘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定期航船离开汉口的，时间大约是在7月下旬，在购买船票时，陈友仁是用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宋庆龄是作为雷娜·普鲁姆女士的秘书，化名为林女士。他们一行6人，到了上海后，宋庆龄就回到在莫利爱路的住宅。陈友仁一家和普鲁姆女士及吴教授都住在南京路（靠外滩）英商汇中饭店。

普鲁姆女士受宋庆龄之托，在到沪后第三天就到上海苏联驻沪总领事馆接洽赴苏手续。苏联领事馆告诉她近期内没有苏联的船从上海开赴海参崴，到8月初，才有一艘苏联客货轮从上海开赴海参崴，要普鲁姆转告宋庆龄，并请宋庆龄在沪稍候。苏联领事馆的负责人还要普鲁姆女士转告陈友仁一家，请他们白天少外出，免得引起外间注意。

这样，宋庆龄就在上海自己的家里住了半个月，家里的人都劝她不要再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来替已失败了共产党说话，更不要发表措词强烈的反对蒋介石的文章。但宋庆龄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即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沉静和机智地准备到苏联去访问。到了8月中旬，宋庆龄通过普鲁姆女士得悉，不久（大约在8月下旬）有一艘苏联的客货船要

以上海开往海参崴，苏联总领事馆已为他们一行6人作好了搭乘该轮的准备。终于在8月20号左右的一个上午，普鲁姆女士告诉宋庆龄，苏联领事馆已准备好了两只舢板船，次日凌晨3点左右在黄浦江的两个不同地点等候宋庆龄与普鲁姆和陈友仁一家。宋庆龄遂于凌晨3时左右偕普鲁姆秘密离开家里，乘坐停在离家不远的法国公园附近的一辆汽车（这辆汽车也是苏联领事馆事先安排）直驶黄浦江边，司机把宋庆龄和普鲁姆送上舢板，并嘱托舢板上的人立即开赴目的地。司机然后以同样方式把陈友仁一家及吴教授送到黄浦江边另一个地点，让陈氏一家及吴教授搭停在江边的另一小舢板赴海上。大约经过一小时的航行，两只舢板先后都抵达停在吴淞口江面上的那艘苏联船。该船在天亮时就起程，经过了一周左右的旅程，到了海参崴。苏联政府派往海参崴的人员已在码头上迎接，请宋庆龄一行在旅馆稍事休息后，就请他们乘坐苏联准备好的专车直赴莫斯科。专车大约是在9月初到莫斯科的。到莫斯科时，车站上已排列着以李维诺夫外长为首的欢迎队伍，其中有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党政机关干部，还有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情景甚为热烈。宋庆龄与李维诺夫及哥伦泰夫人（苏联教育部长）握手后，向欢迎群众频频招手，表示谢意。出站后，由李维诺夫及哥伦泰夫人陪同，乘车赴莫斯科红场对面的大都会饭店。宋庆龄最初就是住在这家饭店的，后来又和普鲁姆搬到糖业大厦，把大都会饭店原来的房间作为她办公和会客的地方。陈友仁一家仍住在该饭店的二楼，直到1928年5月他离开莫斯科到法国去为止。

苏联政府派了教育部长哥伦泰夫人（贵族出身，十月革命前参加了联共党）照料一切。宋庆龄对当时中国革命形

势的分析和估计,对武汉政府时期所发生的一些偏差,对土地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以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长期性等方面的意见,都由哥伦泰夫人转告苏联党和政府。

宋庆龄在莫斯科时,苏联外交部派有专人照料她的生活。特别在饮食方面,知道她喜欢吃水果,每隔一日都派人送高加索产的葡萄、苹果等给她。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曾派代表来邀请她到该校作一次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她因身体欠佳,加上该校中国学生对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所以她没有接受,改由邓演达到该校作了一次有关中国革命形势的报告,颇受该校学生的欢迎。

鲍罗庭回到苏联后,一直在受苏联共党的批评。认为1927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与他领导上的错误是有关的。特别第三国际的罗伊(ROY印度党的领导人)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是得到鲍罗庭支持的。(鲍罗庭在戈壁大沙漠上夜宿时,有一天晚上在帐篷里对我说,他对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是有责任的。但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而是他对蒋介石的认识与估计有错误。他过分相信和重用了蒋介石,他把蒋介石当时嘴上所讲的特别在公开场合所表示的,信以为真,结果受了蒋介石的骗。他说蒋介石是一个大骗子,是一个封建社会孕育的大政客。)所以宋庆龄在莫斯科时,鲍罗庭很少去看她,有时鲍夫人代表他去看望宋庆龄。这种情况在宋庆龄离武汉赴莫斯科时是没有料到的。

宋庆龄到莫斯科后,即与邓演达和陈友仁共同分析了我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经过好几次的回忆和分析,他们一致认为除帝国主义勾结一切反动势力,向革命进行疯狂

的反扑外，国民党本身组织的不健全，不断受到封建势力的侵入、腐蚀和欺骗，大大削弱了革命的力量，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们还认为，为了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今后必须特别致力于国民党本身组织的健全，使投机分子不能潜入。为此，他们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今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并于11月1日以他们三人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指出国民党上层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并指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当时，和宋庆龄生活在一起的是雷娜·普鲁姆，她的丈夫比尔·普鲁姆在宋庆龄偕雷娜赴苏后，就独自到马尼拉去另找工作了。雷娜·普鲁姆自1926年春从北京来到广州，在那里和她的丈夫一起主办英文《人民论坛报》以来，一直在宋庆龄和鲍罗庭身边工作。直到1927年11月21日突然在莫斯科病故为止。是年仅30左右。宋庆龄对她的死是非常悲痛的，犹如失去了一个亲人。以后，每当提到她时，宋庆龄都表示出一种难以抑止的伤感。就在这时，美国有些报纸编造了一个谣言，说宋庆龄正在考虑与陈友仁结婚。这条中伤的新闻把宋庆龄惹火了，她左颈上的一圈顽癣顿时又发作了，痒得几乎无法忍受。虽然经医生诊治，服药，照射，都不奏效。医生说这是一种神经性顽癣，一遇刺激，就要发作，所以要尽量少激动，药物与照射只能减轻奇痒的程度，而不能使之消失。这样她就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在寓所养病，由陈友仁的大女儿西尔维亚·陈在她身旁照料一切。

宋庆龄当时对美国报纸的造谣之所以如此生气，乃是因为她意识到这是蒋介石集团的一个政治阴谋。蒋介石集团想

通过这条新闻使世人尤其是美国人相信：宋庆龄已不忠于孙中山了，她不再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而努力奋斗了，从而来贬低她在世界进步事业和进步人民中的威望。

雷娜·普鲁姆的死和美国报纸的造谣，对于宋庆龄决定离开莫斯科多少是有些关系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常有人问我：你和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当时都在一起，宋庆龄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夕，既然选择了到苏联去和苏联领导人共商国共继续合作，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为什么她到了莫斯科后又要离开莫斯科，而到德国柏林去住呢？

据我的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由于她颈上的癣在莫斯科治不好，所以到柏林去就医，乃是促成她离开莫斯科的原因之一。当她和邓演达与陈友仁商量想离开莫斯科这件事时，邓先生和陈先生都表示赞同。邓先生答应先赴柏林，替宋庆龄找好住处，然后回莫斯科来接她。陈先生则独自赴巴黎暂住，因他在巴黎熟人较多，且这样做，美国报纸谣言不攻自破了。蒋介石集团所搞的政治阴谋也就破产了。此外，当时苏联的政治形势——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斗争又使宋庆龄感到处境有些困难。托洛茨基是在1927年11月被联共开除出党的。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员中，拥护托洛茨基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并不因托洛茨基的被开除出党而停止活动。相反，自那时起，他们活动得更起劲，他们中有人多次要求会见宋庆龄，并希望她发表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斗争的看法。对此，宋庆龄感到相当困难，因她是为了挽救中国的革命而来苏联，想和苏联的领导人共商国共继续合作的大业的，对于联共党内的的问题，她无所知，或知道得很少，更不便发表意见。为此，她对于中国托派学生的请求，都一一委婉地拒绝。在上述这种复杂情况下，她与邓演达一再研究，两人都